

90年前鲁迅记录的酷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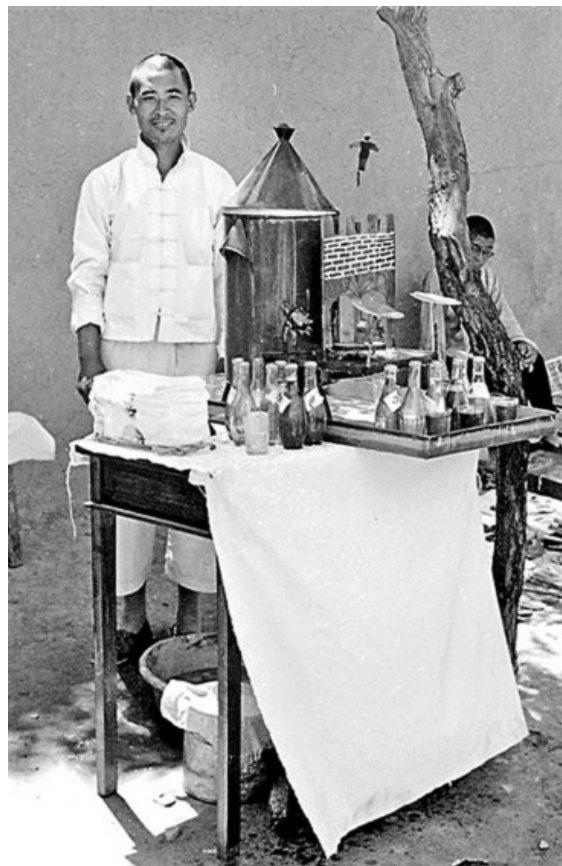
在《鲁迅日记》中,192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酷热难耐,从当年6月到8月,屡屡出现出门吃冰消暑的记录。如“6月15日,夜同方仁,广平出街饮冰酪”,“6月26日,途经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7月19日,同雪峰、柔石、真吾、贤桢及广平出街饮冰”,“7月25日,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8月2日,归途饮冰”。

北平流行过的刨冰

众所周知,《鲁迅日记》简短无比,惜墨如金,重要的人事往来、购书书账、经济收支是其主要记录内容,也统统只是一笔带过。而将多次出门吃冰消暑之事也记入日记,这在鲁迅1929年之前的日记中是没有的。这一方面说明,1929年的夏天确实热不可耐,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冷饮冰品的确让鲁迅很感兴趣。冰酪与刨冰,这两种消暑冰品,在向以严苛著称的鲁迅笔下,留下了记录,实在是颇为难得的。

单听“冰酪”之名,会联想到这大约是类似冰淇淋的冰品,其中掺入乳制品较多,奶味较重,口感细腻。但鲁迅在日记中不将其记为“冰淇淋”或者“冰激凌”的名目,恐怕还是别有所指的。因为查阅同时代文人日记中,1930年代左右身居北平的胡适,任教南京的吴梅等,他们的日记中都出现过吃“冰淇淋”或者“冰激凌”的记录,应当说,冰淇淋这样的冰品,对于当时诸如上海、北平、南京这样的大都会而言,早已流行,并不陌生。鲁迅笔下的“冰酪”,应当是区别于“冰淇淋”的另一种冰品。

实际上,民国时代的冰酪,可能仍是一种刨冰。就拿曾在北平流行过的“雪花酪”来说,有的地方就径直称为“刨冰”。其做法是用带手摇钻的刨床,把冰块卡在圆盘上的卡头上,圆盘上有口子,口子上有长片的刨刀,用手一摇,冰被削成碎花,如同雪花一样,散落在下面的盘子里或小碗里,再在上面浇一些各色的调味汁。调味汁种类繁多,有各类水果汁、糖浆、豆浆,当然,也可能代之各类廉价的色素、香精、糖精勾调的浆汁,这完全是因人而异、丰俭由人的。鲁迅时在上海,个人收入不菲,估计所入的乃是较为讲究的冷饮店,一杯加乳浆的刨冰,他称之为“冰酪”,可能也会勾起他寓居北平时的回忆罢。



▲上世纪30年代北平的刨冰摊 资料图

日记里的“北冰洋冰店”

刨冰是鲁迅颇为青睐的消暑冰品,即使今日,我们对它也相当熟悉与喜爱。顾名思义,刨冰就是将冰块作为材料,像刨木料那样,刨成冰屑、冰碴、冰沙等极微小的冰粒。之后,将其混合果汁或乳浆,用吸管来吃,感觉像是喝饮料(所以鲁迅称之为“饮冰”)。但口感极丰富,微小的冰粒在既融非融之间,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极大的享受。

刨冰在中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宋时代。特别是在宋代,皇家和民间都有大量的冰雪从冰窖中拿出来供给使用,民间的冰雪买卖更是活跃,这当然就促进了冰食的发展和普及。唐宋人把冰雪直接入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冰雪化成的凉水,即冷饮,一种是敲成小块的冰块或未化的雪,这就是冰食了,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刨冰。在宋代,用冰雪制成的冷饮相当普遍,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物,至少在京城中是如此。《宋史》记载,“仆射、御史大夫、中丞、节度、留后、观察、内客省使、权知开封府”,这一级别的重臣,四时八节,皇帝都要有些特别的赏赐;其中,伏日这一天,要赏赐“蜜沙冰”。推测起来,“蜜沙冰”,就是浇上蜜、放上豆沙的冰,也就是刨冰。此外,更有一种“乳糖真雪”,将碎冰之上洒上炼乳,简直就是古典版“冰淇淋”。

1929年的上海之夏,鲁迅明确地记录在“北冰洋冰店”吃刨冰两次(不知与如今尚存的北京“北冰洋”汽水品牌是否有关);1930年7月,还有一次在一家名为“雪宫”的冷饮店吃刨冰的记录。别的“饮冰”记录则过于简略,无从得知是入冷饮店还是就在街边摊吃冰的。显而易见,鲁迅是相当青睐“刨冰”这种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冰品的,他曾多次与亲友们一道,在酷暑中饮冰消乏,其乐融融。虽然因工作繁忙,鲁迅未能将这舌尖上的美意付诸更多的笔墨,却仍在日记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摘自《北京青年报》)

从唐朝诗歌中看当时酒价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从唐朝诗歌中不仅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社会风气,从唐朝关于酒的诗歌中也可以找出唐朝酒价的蛛丝马迹。

宋代刘郃《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于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爽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铜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甫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是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是渊源有自。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

(摘自《光明日报》)

荐书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

麻宝斌、郝瑞琪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系统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全书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理论基础、特征、环境等内容,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的八次行政体制改革;进而从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法治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效能提高等角度,重点分析了历次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背景、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从职能转变、大部门体制改革、行政层级与行政区划、依法行政、公共服务五个方面,展望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孔子政治哲学刍议

胡晓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贯通——孔子政治哲学刍议》,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论语》编排的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解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



身穿淡雅的旗袍,化上精致的妆容,面前的黎甫仁老人很开心,因为她的亲朋好友将于本周日,参加她70岁的生日宴。黎甫仁还精心准备了宴会上的发言:回望过往的峥嵘岁月,一路走来看过繁花似锦,经历世事沉浮,沧桑变幻,唯一不变的只有回归内心的平静。

的确,黎甫仁经历过铁路子弟顶着光环的年代,也经历过国庆15周年株洲的盛况,见证过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开创河西工厂的历史时刻……她的70年,精彩纷呈。

彩旗飘,锣鼓响 国庆15周年的株洲热闹非凡

黎甫仁的父亲是长沙工务段的工人,1953年为组建株洲工务段来到株洲。当时黎甫仁也只有3岁。

“五六十年的铁路子弟,个个都头顶着光环。”黎甫仁笑说,铁路子弟学校有着很多别的学校没有的“特权”。比如,她就读的株洲铁路第一小学组织去南岳衡山搞夏令营活动,当时铁路部门就安排在某一趟路过衡山的火车上多挂一节车厢。“那时候我们走路都是鼻子朝天的!”回忆这些往事,黎甫仁笑得像个孩子。

最让黎甫仁记忆犹新的还是株洲举办的庆祝祖国诞辰15周年纪念活动,“当年,苏联在株洲的援建项目逐渐发挥了效益,株洲的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长沙排在全省第一位。城市骄傲,工人自豪,于是在国庆这天举办了一场盛大空前的庆祝活动。”

借书读,考学校 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

在小学三年级时,因为隔壁邻居的一本《青春之歌》,黎甫仁迷上了小说,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候像是着了魔,一天不看就痒痒”。

只要放寒暑假,黎甫仁就去长沙世代书香的第二家家里,“他们家随处可见书本,随手可取报纸,而且家庭读书的氛围也很浓郁”。

“文革”期间,就读湖南株洲冶金工业学校的黎甫仁不喜欢大街上的热闹,她的时间都浸泡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候想借书回家看,她就想办法搞好与图书管理员的关系,连借带偷地把书本从图书馆里拿出来,“图书馆规定一次只能借2本书。这哪够看!只能想出这样的招,看完后再偷偷塞回书架上。”那段时间她看过不下两百多本小说。

70岁黎甫仁 顶着铁路子弟的光环 回望峥嵘岁月



▲黎阿姨在回忆当年跳过的舞蹈时,情不自禁的跳了起来

做文秘,当校长 最终归于平静

1964年10月1日的早上,晴空万里,株洲的街头被彩旗和气球点缀得一片喜庆。黎甫仁作为株洲铁路中学50名红绸队的成员之一,早早地来到体育馆的大操场(现老体育馆的操场)。

“腰鼓队、锣鼓队、歌舞队、还有彩车等,当年队伍至少有40多支。我们学校就有两支,鼓乐队和红绸队。从体育馆出发,在中心广场重点展示,再走到徐家桥结束。”黎甫仁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湖南铁路机械学校的红旗队。队员全部由1米8的大高个组成,英俊、帅气,我们都看呆了。”

彩车游行的花样也百出,黎甫仁记得当年株洲洗煤厂的彩车上就展示一大块被红绸装点的精煤;河西园艺场的彩车上堆满了大南瓜、大冬瓜和长稻穗等农产品,戴着草帽和白色汗巾的农民在车上呐喊……

1978年恢复高考时,顶着8个月的大肚子,黎甫仁去报名参加考试,结果由于年龄超过了被迫放弃。这个遗憾在1982年的原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株洲分校(现株洲广播电视大学)首次招生的时候弥补了。她一路“厮杀”,在300多名的报考人员中脱颖而出,最终被录取,“要知道,当时只录取了14个人”。

“当年为了能参加这次考试,我一边带着一个3岁大的孩子和一个8岁的孩子,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搞车间的文艺节目创作。”黎甫仁说,“厂里的车间书记同意我参加此次考试的条件就是春节排练一出在厂里拿第一名的节目。”黎甫仁很理解车间书记的“私心”,要是都参加考试去了,车间就没几个人上班了。

黎甫仁在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上班时,从事过很多岗位。子弟学校的老师,厂里展览馆讲解员、检验员、技术改造办公室文秘等。

说起在技术改造办当文秘的8年,黎甫仁觉得企业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飞速发展。“那时候,厂里大量引进瑞典、日本、德国的生产设备,大批的外国技术人员需要到厂里调试设备,日常繁琐的接待任务就落在我这里。”黎甫仁说:“这些技术的引进为企业的发展助力不少。”

黎甫仁说企业刚到河西发展的时候还遇到了困难,“以前上海有句话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三间房。”工厂在河东发展得非常迅速,势头蒸蒸日上,所以很多员工都不愿意去河西开拓新的基地,“基地就在如今的黄山路与湘依路交会处附近,当年那里还是黄土地。第一批在河西开拓新厂的员工们都是在一步一个泥巴坑的基地上摸爬滚打,吃在工地、睡在工地,非常苦。”黎甫仁说:“奠基仪式是我一手策划的。在发言环节,我看到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1998年,敢闯、敢拼,黎甫仁退休后去长沙的石燕湖公园当了十年的副总经理,后来回到株洲做起了学校的招生老师,再后来,在培训学校当校长,之后又创办托管中心,“我还自己投资过项目,搞过开发,属于‘杂家’”。

孩子成家立业后,黎甫仁又忙着带孙子。“我以前是闲不下来的人,总想做点什么事,经历过太多后现在想归于平静。”

(刘白/文 沈三/图)